

孙中山派我创办强华飞行学校的回忆

胡 汉 贤*

1917年12月，我在广州被旧桂系军阀莫荣新以“图谋不轨”的罪名拘捕下狱。1918年1月获释后，孙中山先生因我曾在加拿大各地组织“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^①”回国参加讨袁的关系（此事始末详见《广东文史资料》第19辑拙作《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》一文），命我再往加拿大联络华侨组织飞行学校。当时孙先生面示说：你在加拿大组织华侨敢死队回国讨袁，现任务已完成，又被桂系仇视，你可再往加拿大，将回国讨袁经过，向侨众报告；另你对飞行事业已入门（因我曾参加1915年底孙先生在日本西京八日市开办的“中华革命飞机学校”的飞行训练），可在外国再行深造；并可借助外力，组织飞行学校，培养飞行人材，将来回国效力。孙先生给我一封介绍信，要我到加后找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长陈树人联系（陈是1915年底夏重民离加回国参加讨袁时接任支部长的），并叫我经常与国内朱执信、夏重民等联系，遇有特别事情，则向他本人报告。

我于1918年2月19日在香港坐日本邮船赴加。起程前，先在中华革命党侨海交通联谊社香港分社打一电报给加东域多利城《新民国晨报》（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机关报）有关同志。这里，简单介绍一下侨海交通联谊社的情况。该社是中华革命党联络海员的外围组织，参加成员多是海员，总部设在日本横滨，主持人为严华生（惠州人）、苏无涯（广西人），在香港、三藩市等地设有分社，各主要远洋轮上也设有秘密分支机构，任务是收集情报、运送军火等。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后，该社也改名为海员联谊社，吸收成员范围扩大了，不是海员也可以参加，因而品流复杂，性质逐渐改变了。

28日晨，我坐的船抵达加拿大域多利，有报社同志马杰端、李公武、高云山三人来码头迎接。我向加拿大海关办理入境手续后，同他们三人回报社稍事休息，即往分党部。适是日是星期天，同志齐集，晚上开欢迎会。我将国内情况及军事社（讨袁时在加组织青年党员进行军事训练的组织）同志回国参加讨袁经过，向同志们作了介绍。数日后，我同高云山乘船到温哥华埠（中华革命党加拿大支部设于此，随后改为中国国民党支部）。我先见到前军事社社员曾石泉、刘儒堃，有他们两人陪同前往见支部长陈树人，交出孙先生的介绍信，并说明来意。陈通知各党员于是晚齐集党部开茶会欢迎我。我将回国参加讨袁经过，这次来加任务向同志作了报告，各省同志听后均欢迎我在

* 作者当时系华侨革命志士和“强华飞行学校”的创始人之一。

① 有的回忆录称“华侨义勇团”。

温哥华埠或 B. C 省范围内组织飞行学校，惟陈树人模棱两可，未明确表示态度。我在温哥华住了将近一个月，由于陈树人诸多拖延，筹款及寻找建立飞行学校地址等问题，毫无着落。陈拖延的原因是他正在建筑党支部楼房，需款十余万，他怕同时在温哥华筹建飞行学校，又需十万八万，会影响党部建筑的进行。故他想拖延至党部建筑完成后，始行设法。

我为了急于完成孙先生交给的任务，培养飞行人材，回国讨伐军阀，不愿再在温哥华等待下去，即电加属中部各分党部，征求对建立飞行学校的意见，随得点问顿埠分党部来电表示欢迎。点问顿埠是过去军事社的根据地，回国参加讨袁同志最多，群众基础较好。我乃于四月初离开温哥华，乘火车两天先到加中亚拉佛打省（ALLERTA），先到卡忌利埠，与该地分党部黄民章、何林等见面，谈及回加任务，盘桓数日。又转到列必珠埠，得到黄发文及前军事社同志等的欢迎，应酬了一天，他们对组织飞行学校一事，咸表赞成。接着，我与黄发文到达点问顿埠。各同志见面后，欢迎倍加亲热。过去军事组织的警世钟剧团，仍然存在，且新添了一些有祖国来的新演员，遇有国内外庆典，照常在本埠及邻近各埠演出。我到达后，剧团召集各演员演出新编剧目“袁世凯末路记”，以表示欢迎。在开演前，介绍我报告祖国形势及华侨敢死队回国讨袁经过，我还转达了孙先生对华侨的关怀。以后，又到临近各埠慰问华侨同志。这时加属华侨党员及新联系的华侨群众，多数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的。但致公党仍然与中华革命党闹对立，在《新国民报》与《大汉报》常有笔战之事发生。保皇会已失势，不敢做声，但暗中还是反对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的。

数天后，马超凡等同志从别埠赶来，在点问顿城分党部召集当地同志开会，我把奉孙先生命来加任务加以详述。大家对创办飞行学校，极表赞成。马光珠同志提出，光点问顿一埠，同志虽有数百，恐力量不足，最好以加中名义来筹办，力量较大，经费也容易解决。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，并决定4月召集加中各分党部会议，加以具体议决。

4月5日，加中各省、埠，包括亚拉佛打省卡忌利部、利必珠埠、尾利慎辟埠、市抬珠畔省（SASK）、沙市加寸埠、雷振埠、舞市阻埠、市笔汉埠，与点问顿埠附近列孔埠、列姐埠、草菲罗埠等各分党部均派代表来点问顿埠开会。对筹备创办飞行学校一事，大家一致赞成，但对经费筹措及校址选择等具体问题，则意见颇不一致。最后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，负责筹备事宜，即席推选胡汉贤、马光珠、胡秋昌、马本哲、余灼、黄桢良、研石湖、林胜、李仲唐、陆功甫、马才晃、林安、余百炯等13人为筹备委员。俟学校建立后，这13人即为董事，不用再选。以胡秋昌、马本哲为正副董事长，胡汉贤为校长，余灼为财务员、林安为交际，李仲唐为总务，陆功甫为文书。其他各项任务，也均有分配。

经费筹措办法，分为四种：（1）自由乐捐；（2）加中附属党员每人额捐10元；（3）警世钟剧团筹款；（4）收取学费，学员名额暂定20名，从加中党员中挑选保送年青力强者为主。由于各代表分居各埠，经常召集开会有困难，乃发动各人即席乐捐。胡秋昌带头认捐加币1万元。其余各人量力认捐，合计即席共认捐1万多元。以加中党员约1000人强，可额捐1万多元。两项合计，可筹得经费3万多元。此外尚可发动加东、加西等热心同志助捐，于是经费问题基本得到解决。学员学费，每人每月定收30元。

另外还有捐助实物的。如马本哲捐助小车一部。陆求胜捐助全副修理机器工具。李仲唐、余百炯担任监工建筑机库，等等。

对飞行学校校址的选择，经讨论后，大家认为以沙市加寸埠较为合适，因该埠有公立飞行学校和民办飞行学校各一间，又设飞行协会分会。林安同志在民办飞行学校当机械工人，与该校主持人麦可伦（Maclaren）稔熟，便于介绍接头。于是即席公推林安与胡汉贤两人找麦可伦接洽，并寻找飞行场地。

麦可伦是加拿大沙市加寸埠人，空军驾驶员，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伤后复员回沙市创办民办飞行学校。我与林安同他洽谈，他欢迎我们同他创办飞行学校。当时他的出发点是利用我们的人力财力来发展他的事业。我们考虑到与他合作会对我们诸多不便，经商谈结果，双方同意名义上我们的飞行学校附设于麦可伦的飞行学校之下，名称为“麦可伦民办飞行学校附属华人飞行学校”，以取得合法手续。就内部言我们独立自主，他不得干涉。对内名称为“中华革命党强华飞行学校”，交换条件是麦可伦介绍两个教员给我校，每人每月500美金，又由他介绍购买飞机及零件等物，还由他介绍租一麦园作飞机场，每月租金200元。以后我校学员毕业，由他呈请飞行协会分会发给毕业证书，每张证书给他100元。这几项计算起来，他获利不少。

有了头绪后，即在沙城成立筹备处，召开首次董事会议，通过我们同麦可伦商定的条件和办法。接着派马本哲和林安前往多伦多埠加拿大飞机场购机，购得CN式教练机一架，加币5000元；美式旧式JZ—6双人飞座机一架，加币4000元。另各种零件及修理工具一批，加币3500元。另外，在麦可伦介绍下租给我们的空旷地上（离他的民办飞行学校约二公里）建筑机座一间，工作室一间及其他各种布置等。总设计一切费用，共花了2万多元美金。

飞行学员由各分党部选送，经送往麦可伦学校代为考试，结果选取合格者有林安、余百炯、黄家达、黄臻（即黄荣臻）、余啟成、甄健民、陆露斯、陆求胜、马竞存、张发同、马少汉、梁百平、朱师汉、余锦中、吴心存、胡汉臣、方富谅、李仲唐、朱伯熙及见习生胡汉贤等共22名。另BC省、域多利埠选送来聂光汉，温哥华埠选送来的朱仲良，加东多伦多埠选送来吴求革等，因不属加中范围，被选为备取。

麦可伦介绍两位加籍的飞行员给我校，一叫李麦市（Chaclic Mases），一叫爹佛西（Auest Wind），还有机械工人转臣（Johnson）等。学员中林安、陆求胜也兼任机械工人。这样，小修我们自己可以搞，大修才要找麦可伦飞行学校或飞机厂。

强华飞行学校原定8月1日开学，旋接孙中山先生着上海党部办事处来电，知孙先生已于5月4日向护法国会辞大元帅职到沪。原因是桂系军阀勾结政学系岑春煊与部分国会议员，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制。孙先生不肯同流合污，辞职另图护法。来电要我们联合海外同志，坚持革命，努力奋斗，等待时机回国效力，与军阀斗争，以达护法初衷。我们即提前于7月1日开学。

开学后，碰到的主要困难是经济问题，因学校开办伊始，处处需要支出。飞机零件经常损坏，需用现款提前向飞机厂购买，尤其是汽油每天耗费量甚大，党员乐捐款项已收足，为规定党员每人额捐十元的（共约一万元左右），因缴交的先后不一，收到不足半数。于是有接济不继之虞。幸党员中热心者如胡秋昌、林胜等，一遇学校有困难，即

以个人名义向银行借款支持，随后清还，才得以勉强维持，不致停学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，是警世钟剧团的许多同志，宁愿脱离职业四处演出，筹款接济学校，感人至深，演出剧目又多具有革命内容的。记得有“陈涉吴广揭竿起义，反击暴秦”、“高丽英雄安重根行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”、“冯夏威以死抗美国”等。尤以冯夏威一剧，最为感人。冯夏威是侨居美国三藩市的华侨，亲受亲见华侨受尽美国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苛待，而清朝政府又惧外和腐败不堪，对华侨权益毫无保障。1905年，美国政府又威迫清政府修改和重定《华工条约》（比原来更多限制和苛迫华侨），因而在国内掀起了排斥和歧视华侨的浪潮。冯夏威愤于美帝欺人太甚，又愤清政府腐败无能，毅然归国回到上海，号召国人抵制美货和成立拒约会，并决然留下反美遗书，往上海美国领事馆门口自杀，以死来唤醒国人抗美。冯夏威死后，上海与各地人民开会追悼，激励了反美运动的发展。这一剧演出后，华侨因深受其害，感受最深，解囊捐款者，异常踊跃。

开学以后，学员专心向学，先学飞行原理，次为飞机制造与维修工作，再次为机械与飞机的拆卸与安装实习，最后为飞行训练。为时仅数月，学员多数成绩良好。各处同志来校参观者，络绎不绝。遇有主要成员来校参观时，我们带同他们一起飞游一番，引起他们更大兴趣。于是加东、加西两地不少同志要求把学校扩大，多收学员。但我校因场地及经费所限，不能满足各地同志的要求。因此，有的同志把这问题反映给全加党支部长，指责陈树人不负责任，未对飞行学校统筹办理，致令各地同志求学向隅。陈树人反而怪责我校不与党支部合作。我们答以支部开始既不支持我校创办，事后又无分文支助，现支部想扩大我校可以，但先解决经费问题，对各同志乐捐之款也必有所处置。陈树人没作答覆，以后又提出将学校迁往温哥华埠（即党支部所在地）。学员们纷纷反对，说我们行将毕业，迁校会拖延毕业时间；同时又接漳州粤军来电，说我军不日回粤，要我校飞行员加紧训练，毕业后回国效力。我们将不能迁校理由及漳州来电复陈树人。他反指责我校不服从党纪，诸多挑剔。后他为搪塞加西同志的意见，将聂光汉、高树槐等数人，送到温哥华埠西人的民办飞行学校学习（聂等毕业后，随同我校学员李仲唐等一同回国）。这是飞行学校创办过程的一点小风波。

此后学员愈加发奋学习，加多钟点飞行。不久又逢天气寒冷。每年10月以后，当地习假为“避春节”，温度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，满地冰雪。飞机着陆，原用轮胎已不能在雪地滑走，于是改装为雪橇，故又多用时间学习雪橇，才能安全着陆。是年冬12月，机场结成冰块，学员林安用雪橇单独飞行，着陆时为冰块所阻，全机翻倒，机损人伤，林安断了右足，飞机重新修理，停飞月余，学校因此大受损失。

至1919年4月开春，冰雪融化，天气恢复正常，各学员加紧练习飞行技术，由初级而中级，由中级而达到专技。至7月间，林安、余百炯、黄家达等，已能单独专技飞行。为着配合漳州粤军回粤，决定把部分成绩优良的学员提前毕业，即送麦可伦学校试飞，认为合格，转请沙城飞行协会发给毕业证书。但该会多方拖延，直至10月，又将届“避春节”，始派机师到校验飞。是时，全校学员均以飞行及格，乃一起发给毕业证书。接到毕业证书后，先打发林安、余百炯、黄家达、马竞存、朱伯熙等五人于1920年回国。胡汉贤、张爱同、余启成、黄荣臻等自费往沙城省立飞行学校深造高级飞行技

术，星期天仍回原校自学维修机械及温习飞行。

1920年8月12日，陈炯明、许崇智等自漳州率粤军回粤，讨伐桂系军阀与政学系岑春煊。原来粤军援闽时，附设有飞机队，以杨仙逸为队长，飞行员有李光辉、叶少毅、张惠长、陈庆云、关东华等人，只有飞机四架，人多机少。后孙先生派杨仙逸带领林伟成、黄炳衡、聂开一与在美华侨黄光锐、杨光宇、胡锦涛、李逢仙、陈卓林等一批人在美国学习飞行，又派陈庆云在澳门聘用西人飞机师帮助练习水机。粤军回粤时，以李光辉、叶少毅为飞机队正，副队长，率领机队助战。适有华侨蔡湘臣在美发动华侨捐助飞机两架，由在美学成飞行的陈应权、蔡斯渡率机到漳州，遂加入飞机队一同回粤。在澳门训练水机的陈庆云也奉命驾机向桂系攻击。桂系在粤军海、路、空三方面的攻击下，败退广西。

漳州粤军飞机队与陈庆云等，各驾机回粤，集中于广州大沙头。孙先生于同年11月29日回到广州，旋为非常国会选为非常大总统。孙先生任朱卓文为航空局长，成立两个飞机队。以张惠长、陈庆云为第一队正、副队长；陈应权、林安为第二队正、副队长。我校培养第一批归国之飞行人员，除林安任第二队副队长外，其余黄家达、余百炯等均为该队队员。

援桂之役，第一飞机队随海军出发广西桂平。第二飞机队出发高雷，追击桂系余孽申葆藩。1921年秋季，桂系已被荡平，广西底定。两队均回广州，集中大沙头训练。第一队统辖在澳门训练之水机十多架；第二队统辖漳州原有之飞机与华侨捐助之飞机。两队人员因争功争利，互相倾轧。航空局长朱卓文从地方主义出发，偏袒第一队。朱是中山人，而第一队正、副队长张惠长、陈庆云及队员多是中山人。第二队正、副队长陈应权、林安及队员多属四邑人。意见一直闹到孙先生那里。孙先生很重视，曾亲偕粤军参谋长邓铿到大沙头向全体空军人员训话，强调团结对付军阀，并批评朱卓文处理不当，令邓铿居间调解，联系两队飞行人员。

1921年8月，我校接到国内总支转来孙先生电示，令我校所有飞行员与机械员一律回国，准备参加讨伐北洋军阀。我们即召开校董会，结束校务，决定由胡汉贤带领张爱同、黄臻、余启成、甄健民、陆露斯、马少汉、梁百平、朱师汉、余锦中、吴心存、胡汉臣、方富谅等23人先行回粤；留李仲唐、陆求胜等收拾一些收尾工作，随后回国。我们于同年10月底离开加拿大，11月下旬到达香港，闻孙先生已出发广西。我个人先赶回广州，张爱同等13人暂留香港，听候命令。我到广州后，往见夏重民（夏时任广三铁路局长兼广三路警备司令），他说孙先生已出发广西，即将出师北伐，现仍在梧州。他随即同我赶赴梧州，见到孙先生，我报告强华飞行学校创办经过及这次带领学员回国等情况。孙先生指示说，你们回来正好，现航空局正在编集飞机参加北伐，你们可即向广州航空局长朱卓文报到。同时交代夏重民带我返穗转致朱卓文照办。

我返广州后，张爱同等人亦由港到穗，其中余锦中、吴心存、方高谅、朱师汉等人返乡一行。我与张爱同等到大沙头航空局向朱卓文报到，被分发在航空局插队训练。另有未编队的飞行员周宝衡、陈炎长、蔡斯渡等亦同时插队训练。我本人又被夏重民委兼广三局第一分段分巡官，代理总巡官职务。我因一面要回航空局练习陆空联合飞行，故第一分巡官着文书胡卓汉代理。（陈炯明叛变时，夏重民拥护孙中山，把机车悉数开往

三水，阻止叛军的调运。叛军袭击广三局，把夏重民枪杀，弃尸于河，胡卓汉则被击断右手，此是后话。)

朱卓文用人唯私的做法，上次虽受过孙先生的批评，但他仍没有改变。这次在北伐飞机队的编队上，他还是偏信张惠长等，而排斥其他一些人。张惠长因他的第一队实力差，技术低，看到我校新回国的十余个飞行员实力足，技术较他们高，因而想拉拢我们。结果以第一队及我校新归国十多人为骨干，加上周宝衡、蔡斯渡等，编成北伐飞机队。对第二队人员不选用，编为预备队，留守广州。

北伐飞机队以张惠长，陈庆云为正副队长，下分三个小队。第一小队队长由陈庆云兼任，小队副张爱同；第二小队队长周宝衡，小队副陈香；第三小队队长胡汉贤，小队副蔡斯渡。三个小队飞行员加上炸弹师、摄影员、地勤人员等共30人。每小队配有水、陆飞机各两架，水机因前方未有水机场，暂留广州，陆机随队出发。总部人员除正、副队长外，主要成员有秘书吴光洲，副官宁克烈、宋绍殷，军事委员雷子定及其他军需人员等，总计全队人员共300多人。另编飞机掩护团一团，以张振武为团长。

1922年5月1日，飞机队奉命出发，集中于广州大沙头机场。孙中山先生亲偕黄大伟、陈友仁到场检阅，并作训话，大意是勉励大家服从命令，打倒军阀，奋勇当先等。

孙先生训话后，有编留广州的飞行队员陈炎长擅向孙先生请求随队出发北伐。孙先生查询航空局长朱卓文及飞机队长张惠长，均称陈炎长系初由美国返国，未熟悉飞行作战，且素有神经病，不守军纪，故暂留广州后方。孙先生对陈炎长说：前后方均为国效力，俟有需要时，再委任你到前方。陈炎长因心怀不满，随后陈炯明叛变时，他就投靠陈军，还驾机到肇庆轰炸东下讨伐陈炯明的滇、桂联军，为虎作伥，此是后话。

另有朱卓文的爱女朱慕菲，平日在我队搭机飞行，自称为女飞行家，又与出发北伐的飞行员周宝衡热恋，竟请求随我队出发北伐为飞行员。朱卓文支持她的要求。但为飞机队长张惠长、陈庆云所反对，引起冲突，直闹至孙先生跟前。孙先生下令朱慕菲留在后方，始予平息。这是出发前的一支小插曲。

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西：以许崇智率领第二军及梁鸿楷第一师和李福林的福军为右翼，由南雄进攻信丰；以参谋长李烈钧率领滇军朱培德部、赣军彭程万部为中路，由南雄越梅岭进攻南安、新城；以粤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全部为左翼，从仁化进攻崇义，上饶。三路得手后均向赣州会攻。全部兵力约三四万人。我们飞机直属许崇智指挥，但在作战上则配合左、中、右三路进攻。

至于飞机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经过；及攻下赣州后，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，和叛军激战于韶关，北伐军失败，转入福建等情况，可详见我于1964年4月所写《1922年飞机队讨伐北洋军阀亲历记》一稿，这里不赘。

(1966年)